

第九章 获得新生

乐山路上

我在大渡河沙坪被俘之后，随俘虏队伍经峨眉又被送往乐山县集中。一路上，思前想后，万念俱灰。一想到自己数十年横枪跃马，未曾战死沙场，却落到了今天这种可悲的境地，心里便感到一阵阵痛楚。

大西南的初冬，虽然不似北方那样寒冷，但早晚的天气，还是相当凉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庄里过夜。十几名押送我的解放军战士围坐在柴火堆前，他们一边烤火，一边谈天。当时，我曾对他们讲：“现在你们把西南平定了，将来没有战争不需要这么多军队了，大家到时可以解甲归田，回家乡去了。”我的话刚一讲完，就有一个班长反驳我说：“嗳，你这话不对！我们打垮国民党，解放全中国以后，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要建设一个很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卫我们的国土，不使她再受外国的侵略；同时，我们还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怎么能解甲归田呢？”

听完这个解放军战士的话，我不禁愣住了。真没想到，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竟有这么高的思想、政治水平。这个战士的话，引起了我的思索，使我似乎懂得了一个道理，即：军队打仗，一定要使每一个官兵懂得为什么要打仗，要使大家明白作战的目的，这样才能发挥每个人的战斗力。不然的话，就是装备再好、军队再多，也是没有用处的。

望着眼前红红的火苗，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大革命时期那个火红的年代。北伐头一时期，我们当时在广东的革命力量也

是很小的。面对强大的敌人，为什么我们能够取得两次东征的胜利呢？看来，最主要的就是每一个官兵都懂得作战的目的，知道应该怎样做，怎样对待老百姓。第一次东征时，在部队中广为流传着这样几个最基本的口号：爱国家，爱百姓；不贪财，不怕死。由于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党代表对官兵们反复讲解这几个口号，在统一广东的斗争中，这个思想一步步深入到了每个官兵的心里，所以部队打起仗来很勇猛。那时，部队待老百姓很好，确实做到了不骚扰百姓，因为每个人都明白军队作战同人民相结合的重要性。因此，从一九二五年起，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统一了广东，促使北伐一直打到长江流域的武汉至上海。以后的抗日战争也是这样，日寇的铁蹄，使多数官兵懂得了抗敌御侮的重要性，所以在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许多官兵能够不怕流血牺牲，勇于为国捐躯，以战死沙场为荣。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却违背民意，不思医治战争创伤，建设家园，反而凭着自己有强大的武力，依靠美国帮助装备的部队和美国人的支持，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蒋介石以为凭着飞机、大炮就可以很快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了，谁知仅仅三年半的时间，数百万的军队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地打垮了。

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国民党的力量同共产党的力量对比，在军事上大体上已趋于平衡。但在整个局势上，国民党已处于很不利的状态。蒋介石为挽救危亡，曾于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在南京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解放战争初期的战争，因我还在新疆任职没有参加，这年八月我从新疆被调回来，参加了南京的这次会议。当时，每一个到会的将领差不多都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大家情绪低沉，会场上笼罩着阴暗、郁闷的气氛。看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会上讲话说：“我从新疆回来，途经兰州、西安、武汉时，碰到了许多团营级的干部，他们曾围着问我：‘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打仗？’我当时无言以对。今天，我也要这么问一句，我

们为什么要打这个仗？从一九二四年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我们没有一年不打仗，国家元气损失很大。说句刺耳的话，抗战胜利后，我们应该同全国人民一道来设想怎样把国家搞好，应该把力量全部投入到国家建设上，而不应该再有战争。军队如果不能理解作战的目的，我们怎能保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呢？”

.....

所以，听了这个解放军战士的话，我内心深有感触。从这个战士身上，我感到共产党对部队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是非常好的，当时我似乎也体会到了国民党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为止，仅两年的时间，国民党的军队已损失殆半，而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开始，共产党的部队已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了。正因为蒋介石依靠的是飞机大炮，忽略了人的能动性，所以尽管狂轰滥炸，还是无法遏止解放军前仆后继的强大攻势。不理解作战的目的，士无斗志，也许这就是国民党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还会被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很快击溃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这一夜，我想了许多许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方面为国民党部队中许多士兵的死亡感到惋惜，一方面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心伤。

照相风波

当我们拖着无力的双脚快到乐山县城的时候，远远就看到有不少解放军战士站在城门外。待走近时，方看出大约有一连左右的人。等我和身后的十几个将官到跟前时，押送我们的一个排长让我们十几个人站到这一连人前面。这时，一个身背照相机的解放军干部出现在队前。我一看，立刻明白这是要给我们这些将官拍照，目标自然是要以我为主要对象。当时，我思想上很反感，

心里极为不快，心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了，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想到这，我便把心一横，准备捣乱。待照相的青年干部（某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举起相机，对好镜头，就要按动快门时，我突然转身扭过头去，使对方没有照成。如此反复了四、五次，气得这个干部毫无办法，最后还是没有照成。因为队伍还在行走，不能久停，所以我们也就随着俘虏队伍进城了。

进城后，解放军把我们十几个将官带进一所民房里。还未坐定，在城门口给我们要拍照的青年就气呼呼地走到我面前，冲着我说：“宋希濂，我是奉命执行任务的，你竟敢破坏我的工作，我枪毙你！”

院里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我身边的十几个将官都为我担心。我当时因为态度很顽固，且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仍若无其事地看着这个发怒的战士，冷笑着说：“枪毙我？很好啊！在这个院子里执行，还是到外面去执行？”

“你，你……”这个青年干部被激怒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悻悻地转身走了。

这时，我的部下，几个将官对我说：“不要这样，何必呢。”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顶多不过拉出去枪毙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门口开来了一辆小吉普，点名叫我一人单独上车，说是司令员找我谈话。我的部下一听，个个都感到发慌，又为我担起心来。当时，我也感到事情有点蹊跷，默默地看了看这些随我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部下，心里一阵发酸，很感对不起他们。我向大家点点头，算是最后的道别，然后猛地转身向院门口的汽车走去。

汽车在城里行驶，开进一所中学后停了下来，我被领到一个年轻的军人面前。此人穿着普通战士的衣服，脸上总露着笑容。

他一见我走进来，便放下手边的公文，指着桌旁的椅子说：“请坐。”

我打量着对方，猜测着他的身份。正在我满腹狐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为我倒水的战士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兵团司令员杨勇。”

“什么？”我惊的一下子站起身来。这就是自己战场上的直接对手，第五兵团的司令员杨勇？

“坐下谈，坐下谈。”杨司令员和蔼地笑着说：“宋将军，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在长沙时就曾研究过，估计并非没有争取你起义的可能。有几个人，一个是你的大哥，还有几个是你的朋友，其中有个姓段的，还有个姓刘的，他们当时准备到湖北恩施去找你。但还没等他们到你那去，你们已向西退，解放军也已前进了。此后，大家彼此赛跑，联系不上，也只好听任事情的自然发展了。”停了一会儿，杨勇又接着说：“话说回来，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对过去的事，你也就不必太计较啦。现在你先安下心来，考虑一下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好好改造一个时期，将来到北京去，看一看我们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是怎样治理这个国家的……”

杨勇司令员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他很耐心细致地为我讲解了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政策，嘱咐我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好好改造思想。最后临走，他送我出来时又诚恳地说：“宋将军，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些还很年轻，不大懂事，希望你不必计较。”

一听此话，我知道是指昨天发生的照相之事，心里很受感动。想不到为了这么点小事，很快就传到兵团司令的耳朵里了。本来是自己的态度不好，可杨司令还这么讲，这使我感到解放军确实了不起。

过了一天，那个照相的工作人员又来了。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讲：“那一天，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我一听，心里也很过意不去，赶紧说：“是我的态度不好，影响了你的工作，实

“对不起，以后你爱怎么照，就怎么照吧。”我的话，将围观的人都逗笑了。于是，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这件事却使我有很大的感触，多年来，一直难以忘怀。

在白公馆里接受改造

杨勇司令员的召见和谈话，确使我很受感动，心情较为平静了，但一想到今后可能还有服不完的苦役、坐不穿的牢底，和自己的子女不会再有重聚的机会，前途茫茫，仍觉意念索然。

在乐山住了几天，我又被解放军用汽车送到了重庆。住在重庆市化龙桥一栋民房里，我见到了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一见面，我们互相询问了被捕的经过。王陵基满脸愁容，唠唠叨叨，整天担心共产党会把他杀掉。我把杨勇司令员接见的事讲给他听，一边分析，一边安慰他说：“看来共产党不会杀掉我们的，最起码在近期内不会杀我们，坐一辈子牢还是可能的。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步境地，发愁也没有用，不必考虑那么多啦。”

在化龙桥大约住了五、六天，我和王陵基在一天早上被几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上了一辆四面都用木板遮掩起来的卡车，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人告诉我们。王陵基一见，悄声地对我说：“完了，要送咱们回老家了。”

汽车直奔郊外开去。从汽车行走时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的程度来看，我们知道离市区越来越远了。王陵基由此推断，共产党要秘密处决我们，因而，他的神情越来越紧张。受他情绪的感染，我的心里也划起了问号：“难道不经审判，真要这样枪毙我们吗？”

车子行驶了约半个小时终于停下来了。我们下车后，一看这里完全不像行刑的场所，而是一栋周围树木茂盛的两层楼房。一打听，方知这里就是臭名远扬的原国民党军统局设置的监狱——

白公馆。

白公馆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香山别墅。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军统局将它买下改为监狱，一九四三年美国和国民党合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时，白公馆改为第一看守所。监狱内地方不算大，四周高墙上电网密布，墙外制高点上有岗亭和碉堡，过去这里囚禁过许多有名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及抗日爱国将领。真没想到，国民党为囚禁共产党人而改建的监狱，竟在几年后为我们准备下了。

刚进白公馆，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干部，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这个管理所的张所长。张所长领我们上了一座小楼，在楼西边一间套房前停下来。他向我们介绍说：“这是白公馆里最好的房子，你们猜猜看，谁在这里住过？”我和王陵基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张所长接着告诉我们，叶挺将军当年就是被囚禁在这间房子里。我们听了更感惊愕。白公馆、叶挺住过的房间，真是巧合，我们今天也成为要犯来到了这里，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改造生活。

过了几天，在涪陵被俘的原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也来了，我们三人同住一室，开始时无事可做，只凑在一块聊聊天。那时我有几两金子，是交李管理员保管的，就请他以二两换成货币，为我们购买了不少书籍，有马列著作，有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也有一些中外文艺作品，如丁玲、高尔基的小说等。订了报纸，还买了象棋、围棋。这样就有书可看，有棋可下，不再感到那样孤寂了。我和钟彬都是棋迷，没事时就在棋盘上厮杀，常为一步棋、一个子的得失而计较、争执。王陵基在一边看我俩下棋的那股认真劲儿，常常捧腹大笑。他经常讥笑我说：“你连兵团司令都肯让给钟彬，为什么一盘棋都不肯相让呢？”我则没好气地说：“这完全是两回事嘛，你别往一块儿扯。”

在白公馆的头一段时期，由于人少，所以也没有什么活动，连学习也是自己掌握。后来到了一九五〇年，刘进（黄埔一期

生）、李尤能（中统局西安站站长）、周养浩（军统重庆特区副区长）、徐远举（军统重庆特区队长）、沈醉（军统局云南站站长）等人陆续被送来后，所里才开始正式组织我们学习。

学习的内容有：形势教育，主要是读报纸；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的方式多种多样，有集体学，有自学，有典型发言，集体讨论，也有小组讨论。目的是提高思想觉悟，认清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恶。

当时在白公馆被关押改造的人员中，还有一个级别较高的曾扩情，他也是黄埔一期的，曾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他住在我门房那间房子的楼下，同许多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小特务住在一起。据张所长说，曾多次要他住到楼上来，但他本人不愿意。他认为住在楼上大房间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是大战犯，而在楼下的都是小人物，同大战犯住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不论别人怎样劝，他都不愿搬到我们住的房子来。

那时，我们住在一起的九个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大家都认为自己即使不被枪毙，也会一直关到死。虽然我们吃的、住的条件较好，管理人员对我们也不错，可大家还是提不起精神。但没过多久，一件突如其来的喜事打破了我们生活的平静，使大家改变了以往的看法，看到了改造的前途。

一九五〇年春天的一天早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突然来到磁器口白公馆来看我和曾扩情、钟彬，并告诉我们，陈赓将军（时任云南军区司令及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特地从云南来看我们三人。我们一听都喜出望外，没想到陈赓将军会来看望我们这些被关押的战犯。当时，我的心里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陈赓将军不忘旧日的友情，身居高位还能主动来看狱中的老同学、老朋友，惭愧的是自己当年未能追随陈将军去为穷人打天下，反而追随蒋介石与人民为敌，终至成了一名历史的罪人。

我们三人随周兴乘车到了市区。汽车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住过的公馆里停下来，我们被领进一间宽敞而明亮的房里。陈赓将军一看见我们三个黄埔一期的老同学，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当陈赓同我握手时，仍象过去那样爽朗地笑着说：“你好啊！我们又有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

“惭愧得很，没想到您还会来看我。”我当时紧紧握着陈赓的手激动地说。

“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陈赓若有所思地问。

“那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之后，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来看我。”

“对，那次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看你的。记得当时我曾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这该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啊！一晃又是十多年，我们见一次面，好不容易啊。”陈赓将军的一席话，使我的心平静下来了。

接着，陈赓将军又同我们谈起了许多往事，从上午九点一直谈到下午四点。中午，陈赓及周部长还为我们预备了午饭，大家边吃边谈，一顿午饭竟进行了两个小时。最后临走时，陈赓将军又给我们讲了讲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勉励我们好好改造思想，他说：“你们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利用这个机会多看看书也很好。”他又对周部长讲：“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我们在重庆白公馆期间一直同所长一样，是吃小灶的。在生活上，所里对我们几个人的照顾确是无可挑剔的。

回到白公馆，大家知道陈赓将军接见和宴请我们几个人的情况后，都感慨万分，逐渐解除了对共产党改造政策的怀疑，开始认真考虑自己后半生应该如何度过了。

共产党确实了不起

我在白公馆大约呆了三年。一九五三年，西南公安部在松林坡建了一所新的监狱，我们遂搬了进去。

松林坡监狱是所正规监狱，比白公馆大得多，这里有许多房间，每间房住六个人。每天起居生活，安排学习都井井有条。吃的、住的条件都很不错，这里除了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大小战犯外，也有少数被判刑的共产党干部。

有一天，监狱所长叫把所有监房门都打开，大家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会儿，只见几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进一个上了大刑的人进来。这人戴得很重的脚镣、手铐，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地直响。大家一看，都很吃惊：“这人犯了什么罪，上这么重的大刑？”听完所长的介绍，才知这人原是共产党的一个中级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到处吃吃喝喝，贪污受贿。此事对我们触动很大，感到共产党真是执法严明，不论谁犯了罪都一样要受处分。大家也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确实够宽大的。论罪行，多半都是严重的，但对我们不打不骂，生活上还多方照顾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改造成为新人，这种作法恐怕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经过几年的改造，看到社会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确实了不起。不但在军事上要比国民党有战略眼光，就是在经济建设、治理国家上也比国民党高明得多。从下面几件事可以看得很清楚。

1. 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滥印钞票，致使物价一涨再涨，市场上十分混乱，通货膨胀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几乎被老百姓当作了废纸，一口袋钞票在市场上换不来一个鸡蛋，人民怨声载道。当时，我就想过，国民党的通货膨

胀搞到这种地步，即使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副烂摊子也够收拾的。哪怕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解决，要使物价稳定下来，不是三言两语或是一个行政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有充实的物质力量，而这没有三、五年，根本解决不了。但是，不到一年的工夫，共产党政府竟基本上控制了市场，稳定了物价。当时，我就很奇怪，共产党究竟用了什么方法使物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基本稳定下来了呢？

为此，我一方面看报纸，一方面向人打听，了解了一些情况。原来共产党的主要办法就是依靠民众。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交通不便，积存在县上的粮食运不出来，共产党发动广大的群众，把多余的粮食运到交通方便的地方。这样，用粮食作基础，调节市场，稳定了物价，限制了通货膨胀。这一着棋，不能说不高明。

2. 进军西藏

一九五〇年春天，我在白公馆从报上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派部队准备进入西藏，并很快同西藏方面签订了和平协定，解决了西藏问题。看到这一消息，我是很高兴的，认为解放军进驻西藏是个了不起的政策。因为有些国家对西藏早有野心，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的国家也想一口吞掉西藏，当年我在滇缅边界同日军作战时就曾有过一种想法，即在战后将大理、保山、腾冲、龙陵、芒市、片马、施甸、阿敦子、西昌等地划为一特别区，以建设边疆，控制西藏。为了实现这一设想，我曾派参谋处长冯宗毅到河敦子一带，请西南联大地理系主任张印堂教授为团长到腾冲以北的片马、施甸一带实地调查，同时，我还命司令部高参袁策到金沙江上游去调查。当年，我曾把这一设想写成报告，派人送给蒋介石侍从室贺耀祖主任，他对我的这一设想觉得很有意思，表示同情。这份报告，蒋介石可能也看过，但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缺乏全局的战略眼光，西藏问题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当时，国民党军队打通中印公路之后，在云南有十几个军，却从未有派

一支部队进入西藏的打算。如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高瞻远瞩，西藏问题恐怕就很复杂了。

3. 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年，中国派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我们在白公馆知道此事后，大家议论纷纷。在我们的心目中，美国是个庞然大物，强大得很，对能否打赢这场战争表示怀疑。

当时，我曾听人讲，对是否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毛主席曾找了很多人的谈话，要大家讨论，发表意见。据说，不少人表示不赞成出兵，认为我们只需准备足够的力量守住鸭绿江就可以了。主要理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力量，物价还没有完全稳定，经济建设还未开始，国家的元气没有恢复，派军队去，恐怕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战争。但毛主席洞察全局，最后还是作出了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

这场战争是很残酷的。我有一个侄子和侄女都亲身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据他们讲，美国人的飞机每天二十四小时连续狂轰滥炸，使人不得片刻的安宁。我的侄子是个铁路工程师，有时七天七夜都不能休息。因为交通一中断，补给供应不上，几万军队的吃饭问题就难以解决。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敌人飞机轰炸的间隙去恢复交通，保证公路、铁路两条运输线的畅通。我侄子宋承舜回国时，整个人似乎都失去了知觉，经过一年的休养，才恢复了健康。战争的结果是美国不得不坐下来谈判，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在板门店签字时，美国的一位将军李奇维曾说：“美国自有陆军以来，这是第一次在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停战协定。”

据说，当时美国军队在远东地区的统帅麦克阿瑟曾跑到台湾对蒋介石讲：“你们过去有数百万军队，又有许多美国装备，为什么很快被共产党打垮了？共产党没有很好的装备，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得这么厉害？”

朝鲜一战，确实打掉了美国不可一世的威风。自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意、日被打垮，英、法的实力也受到削弱，苏联的损失非常大，惟有美国在战争中发了财，壮大了实力。所以，在一般人的眼中都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可是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却打破了这个神话，使美国军队丢了脸，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在中国利用租界、领事裁判权，到处横行霸道，犯下了许许多多的罪行。他们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为所欲为，肆意践踏中国的法律，由于统治者奴颜婢膝，屈从于外国势力的压力，不敢对外国人采取行动，致使中国人在世界上到处受人歧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才真正抬起头来。不论你是哪国人，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外国人再也不敢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耀武扬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得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鼓舞，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此可以挺直腰板了。

4. 修建成渝铁路

清末民初，我国曾有过从成都到重庆修建一条铁路的计划，当时的政府曾向国外借款，动工修建，但没有修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同法国人谈判，希望外商投资，帮助修建，最后还是没有修。

解放后，邓小平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在一九五〇年按照中央的指示，于当年三月开始组织人力修建成渝铁路。当时，国民党在西南的残余势力尚未完全肃清，有些地区的叛乱还没有平定，但共产党政府却毅然挑起了这个重担。我们在重庆一听说共产党已开始修建成渝铁路，就感到十分惊疑，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国民党人员，都不敢相信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能修好这条铁路。可是，没过多久，大约是在一九五二年七月，我们在白公馆里忽然听到了火车的声音，询问之后，方知当天正在举行成渝铁

路的通车典礼。一听此讯，我们个个既惊又喜。惊的是共产党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修成了前人想修而未修成的铁路，喜的是从此由成都到重庆的交通再也不用发愁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感到过去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只说空话，不干实事，共产党则是扎实实地干了再说。

5. 关于新疆和平解放问题

被俘之后不久，我从报上得知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统帅下终于占领兰州、河西走廊后，王震司令员的第一兵团进入新疆，致使新疆得以和平解放。我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到新疆的，一九四八年八月正式调离新疆，对新疆有所了解，总的说，我认为苏联觊觎新疆之心自来已久。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新疆以前的事可以不谈，只从盛世才时期之后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盛世才，字晋庸，东北辽宁开原县人。早年曾在东北奉军第八旅郭松龄部下任职，一九二三年，张作霖送他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由于郭松龄倒戈反张，张作霖撤销了保送盛世才留学的公费。因为无钱，盛世才四处钻营，终于通过张群与蒋介石拉上了关系。蒋介石曾送他三千日元作学费，所以后来盛世才自称是蒋介石的学生。盛在陆大毕业后，回到国内在南京参谋本部第一厅工作。盛世才是个有野心的人，当然不满足于长期充任一个小小的上校参谋，因而郁郁不得志，很想到边疆去，以求有所发展。

当时统治新疆的是金树仁，由于金的军队中很少有人懂军事，部队素质差，所以很想找几个懂军事的人来帮他训练部队。但金树仁一方面希望自己部队中能有懂军事的人，另一方面又害怕部队被这些人掌握，所以一直拒绝军人进入新疆。盛世才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金树仁的秘书长鲁效祖，才于一九三〇年秋进入了新疆。

盛世才入疆后，先在督办公署当参谋，继又在金树仁办的军

官学校当战术教官。因他有野心，所以在学校时常找些学生谈话，联系了不少人。一九三一年，哈密一带发生变乱。盛世才逐渐被金树仁重用，先是派他在督办公署当参谋处长，继之又委他到哈密地区当指挥官。盛世才千里这才有了兵权。哈密民变被平定后，盛的力量逐渐增大。一九三三年，盛的部队被调回迪化作战，他利用陈中、陶明樾、李笑天发动的“四·一二”政变，赶走了金树仁，成为新疆的最高统治者。但当时马仲英的势力在新疆各地也在发展，南疆局势动荡，盛的兵力有限，乃派人与苏联联系。盛在苏军的帮助下平定了南疆，基本上肃清了境内的叛乱。盛世才同苏联的关系遂日益密切。苏联进入新疆的部队在平叛之后，留了一个混成团驻在哈密。此后，苏联还派了大批的顾问（约四、五百人），在盛世才的各个部门工作。

蒋介石得知盛世才成为新疆最高统治者后，便极力想办法拉住盛世才，曾派外交部长兼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陆军大学教育长黄慕松先后到新疆，企图说服盛世才接受南京的领导，但盛世才没有理睬他们。后来，蒋介石又派曾在韶关讲武堂当过督办的李根源到新疆去说服盛世才，因盛世才早年曾在李根源主办的讲武堂学习过。但李到新疆后，盛只是以师礼相待。生活上百般照顾，却从不谈实际问题，把李根源软禁在纪昀（字晓岚）被清廷充军到新疆住的“阅薇草堂”之中。李在此地被软禁了好几年。

由于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日渐增大，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胜利后也派毛泽民、陈潭秋等到新疆工作。盛世才看到苏联与共产党势力在新疆不断增大，很不放心，但他又不敢一下子得罪苏联，遂想办法控制新疆的军队和警察。当时，各地警察局的权力大都高过本地的县长。

一九四〇年，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来到新疆迪化，企图说服盛世才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加盟苏联。对这件事，盛世才感到中国这么一大块土地若是在自己手中丢掉，在历史上恐怕要负责任，没敢答应苏联的要求。但盛世才惧怕苏联

的压力，又不好直接拒绝，便玩弄手段，天天请客，避而不谈此事，使维辛斯基在迪化住了半个多月毫无所获。这样，他同苏联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二次世界大战起来后，苏联受到德国的进攻，需要大批的物资，要盛世才提供马、牛、羊及各种物品，使盛世才感到很苦恼。于是，他便派人秘密与蒋介石联系，蒋利用这个机会，答应帮助他，盛世才由此开始反苏。

一九四一年冬天，德国军队在苏联境内攻占乌克兰，开始进逼莫斯科，苏联处在极端危险的境地。盛世才趁苏苦于应付德军无暇东顾之机，开始公开打起了反苏的旗帜。盛赶走了驻在哈密的苏军混成团，辞退了所有的苏联顾问。与此同时，蒋介石派了四个步兵师及骑兵第五军进入新疆。蒋介石在国民党部队站稳脚跟，认为已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新疆的局面后，遂于一九四四年九月把盛世才调离新疆，到重庆去就任有职无权的农林部长一职。

但没有多久，苏德战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苏联粉碎了德国的进攻，并向德国本土上推进，一直打到了柏林。待苏联在军事上腾出手来之后，便决心对占据新疆的国民党政府施以报复。原来苏联认为新疆由盛世才统治，盛不会同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生联系，并且完全可以控制住盛世才和新疆，但没料到苏德战争爆发，盛世才竟趁机反苏，赶走苏军、驱逐苏联顾问，投进了国民党的怀抱。于是，苏联便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支持当地武装打出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旗号，反对国民党对新疆的统治。

三区武装在成立临时政府之后，因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兵分三路，中路很快打到乌苏、精河一带，重庆方面受到很大的震动。蒋介石遂派张治中赴新疆同三区进行谈判。那时，我也到达了新疆，先后担任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分校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辕参谋长、新疆警备总司令等职务。

张治中到新疆后，谋求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在苏联方面的协助下，双方都作了些让步，达成了以和平方式解决三区事变问

题的协议。伊方以三区为基础，和参加省府工作的便利，极力向南疆、东疆方面发展，以求最后达到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目的。我曾以西北行辕参谋长的身份和三区的军事指挥官伊斯哈克江等人进行过多次谈判，他们坚持要国民政府给钱及装备，保持六个团的部队，但绝对不同意任何人进入三区，即其一例。一九四八年我调离新疆，职务由陶峙岳将军接替，那时新疆的局势仍是动荡不安的。

一九四九年，新疆发出了和平起义的通电。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派人到新疆联系，争取新疆方面和国民党驻新部队能够和平起义。毛主席看得很远，知道假使驻新的国民党部队被三区力量消灭，则新疆问题更会复杂，今后就不好从内地派部队进入新疆了。所以，毛主席、共产党一直希望新疆问题能够和平解决。王震的第一兵团准备进入新疆前，曾多方促使陶峙岳将军宣布起义、接受改编。

新疆和平解放的消息很令我鼓舞。想到自己在新疆三年多，虽也想立功边陲，做出一番事业，但最后还是扔下了一个烂摊子。若不是毛主席看得远，派兵进入新疆，使新疆的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那今天的新疆恐怕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上述几件事情对我的启发教育是很大的，经过认真的思考、对比，我改变了过去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讲国际主义，不讲爱国主义的偏见，开始相信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方法了。这样，自己的世界观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影响，开始对自己追随蒋介石反共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

功德林里的改造生活

思想改造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改变一个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立场、观点，非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不可。政府为了加速对我的改造，决定把我从重庆送到北京学习。因此，

我于一九五四年由重庆松林坡来到了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

我到功德林后，管理人员安排我单独住一房间，不到几天，心情就觉得烦闷起来。原来在重庆先是三人，后是十来个人住在一起，大家可以有说有笑，看报、下棋。可现在一人关在一间房里，既没有聊天的对象，也无下棋的对手，最可悲的是连报纸也看不到。这样我思想上又有了很大的波动。

一天、两天，我每天计算着日子，盼望能和大家在一起。由此也生出了不少怨言，自觉这几年改造已有了不小的进步，为何反而越改造越糟糕，蹲起小号了呢？不到半年的工夫，我的身体开始感到不适，脑袋经常感到眩晕。有一天，我感到头晕的不得了，医生得知后给我一检查，血压高达二百多，随即将我送进公安部医院诊治，在医院躺了十多天。血压平复后，才又回到功德林。在我的诊断书上，医生写的是“神经性血压高”。显然，这与自己的苦闷、思想波动有关。

我从医院回来后不久，管理所的王科长找我谈话。他叫我把有关揭露四大家族罪恶及讲述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书看一看，并说：“你认真地读一读，看完后写个总结，谈谈自己的感想。”

这一类书，我在重庆时就读过一些，所以很快就写好了一篇将近千字的读后感。送上去后，王科长又找我谈话，说：“你的总结写得不错，有一定的认识。这样吧，我看你一人也挺闷的，去和大家一块学习去吧。”就这样，对墙面壁，顾影自怜的苦闷生活终于结束了。

离开小单间，我同邱行湘、康泽、郭旭、梁培璜、沈蕴存、陈长捷等十人被编为一组，住在一个房间里，又过上了集体生活。

一九五五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学习，读书看报、讨论时势，以提高思想觉悟。大约到了这年的十一月，有一天屋里的人都除我和邱行湘外，其他的人都搬走了，同时杨伯涛从别的组搬到了我们住的房间。我们三个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知其他人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

几天，我们才搞清楚，原来是内部调整，以准备迎接从外地集中到功德林来的人住。从这时起，我们的伙食大大地改善了。每顿饭由一菜增加到两菜一汤，主食也有所改善。

不到十天，功德林里陆续来了不少人，大约有一百二十人左右。范汉杰、廖耀湘等人从东北调来，王耀武、陈全城等由山东调来，早已来到功德林的杜聿明也搬来了，其他的还有一些军长也陆续从重庆、武汉、西安等地集中到了功德林。组与组之间原来是不许会面的，这时也允许大家互相见面，随便交谈了。一见这么多老熟人，大家都很高兴，彼此相贺，庆幸余生。

管理所把这一百多人分成十一个组，每组选派出组长、副组长，由我和王耀武负总责，管理这一百多人的学习与生活。但把这么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集中到一起到底干什么，我们谁也猜不透。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上午，功德林的负责人，原公安部第十三局局长姚伦，在礼堂给我们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姚局长的讲话解除了我们的思想负担，使我们知道集中是为加速对我们的改造，以便使我们早日成为新人。接着姚局长还谈到对我们在初期改造中不得不采取强迫改造这一形式的原因，并宣布今后准许家属亲友前来看望及对外通信。最后，姚局长勉励我们自觉地进行改造，还向我们宣布说，不久将组织大家出去参观，让大家看一看国家发展的情况。

姚局长的话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从这时起，由于大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谈心，交流意见了，所以每个人学习的劲头都有所增高，整个功德林的气氛也比过去活跃多了。

一九五六年的五、六月份，管理所组织我们在北京附近参观。我们先后参观了北京市的市容、北京郊区的水利建设。另外，我们还参观了一些新建的工厂，尤其在市郊参观某棉纺厂时，我的感触是很深的。

这个棉纺厂是建国后新建不久的工厂，厂里大多是女工。据

厂方领导介绍说，这些职工在旧社会人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她们中有一大部分是北京原来八大胡同的妓女，靠卖身维持生计。解放后，政府为安置她们，兴建了工厂，让她们参加劳动。现在多数人已经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厂里还有一部分人，曾参加过帮会组织，过去专干绑票等不法之事，政府对这部分人在进行劳动改造后，现在也给予自新的出路，为他们安排了工作，把他们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听完介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旧中国，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有许多以卖淫为生的妓女。她们中的大多数是良家女子，由于生活所迫，才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旧社会的帮会组织是很多的，青帮、红帮、四川的袍哥，这些地痞、流氓无恶不作，到处欺男霸女。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也是好事没干，坏事做尽，开烟馆、设赌场、贩卖人口、武器，作奸犯科，用尽各种办法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鸦片之害，尽人皆知。在旧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子。过去军阀统治时期，他们在云南、四川大种鸦片，将鸦片运往香港、天津、上海等地贩卖，赚到钱后又向外国购买军火，造成了中国长时期的内乱。鸦片对中国人的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毒害确实很大。记得过去我有一次到重庆，过江后要上山，叫了一乘滑竿。抬滑竿的轿夫长得面黄饥瘦，上山一趟，沿途竟要抽三次鸦片。山道边设有专卖鸦片的馆子。一间小房，在窗口架了几杆烟枪，烟是早已装好的。交钱后，马上就可以吸了。我当时很奇怪，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抽鸦片，难道就不能不吸吗？”轿夫说：“抽上了瘾，不吸烟就没有精神，上不了山。”由此可见，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之深。烟、赌、娼确为中国的三大祸害。所以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先是禁种，再是禁卖、禁吸鸦片，从而使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了。能在几年之内，使毒害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烟、赌、娼绝迹，扫除过去大小军阀割据的局面，完成了在大陆上的真正统一，确实是做到了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

的污泥浊水，使祖国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不能不说是个壮举。

这年的七月间，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到管理所来看望我们。先后来的人有：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卫立煌及一些朋友。能同他们谈一谈，听听他们对国家形势的分析是很有意义的。据他们中有些人透露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有意在不久要特赦我们，大家知道后都感到很兴奋。当年确实已准备在秋天特赦一批战犯的，但却因故推迟了，后来方知道是因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所以才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一九五七年五月间，政府又组织我们到东北去参观，到了沈阳、长春、鞍山，参观了长春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厂、铁西工业区、长春市容等等。东北之行，一共三个星期。参观归来，大家都感慨不已。没想到才几年的工夫，社会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回到功德林后不久，大约在这年的七月间，我们又启程到武汉，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厂和一个现代化的屠宰厂。回京后，又继续学习。通过这几次参观，我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国家在这几年里发生的变化。不少人在谈心得体会时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争取尽快地得到政府的宽大，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获得新生

一九五八年秋天，管理所组织我们到秦城进行劳动锻炼。但规定年老多病，身体太弱的人不能去，继续留在功德林里学习。因为我有血压高的毛病，身体不太好，所以领导上要我留下，不让参加劳动。但在我一再要求下，领导上经过讨论，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

参加劳动的人共分为五个队，身强体壮的编为一、二队，年老体弱、身体差些的被编为三、四队，我当时被编入了第三队。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们遂于这年十月中旬跟着带队的管理干部来

到了秦城。

秦城坐落在京郊北面燕山山脉的脚下，附近群山迭起，绿树成荫。山上的龙泉古寺，小汤山的亭台楼阁，涓涓温泉早已久负盛名。能够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呼吸到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这使我的精神豁然开朗，自觉一下子又年轻了许多。

开始劳动时，一、二两队到大田里干活，我所在的这一队是上山栽果树和负责果树的管理。刚到秦城时，我的思想还有些负担，认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劳动过，怕乍一干起活来吃不消。可没想到给我们安排的都是轻活，每天只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过去也常听人讲过，犯人劳动改造就是服苦役，每天累得死去活来。有些外国人也是，一提起劳动改造就吓的不得了。其实，共产党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的目的，并不是想惩罚我们，而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劳动锻炼，培养一些劳动人民的感情，使我们能够树立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目的仍然是为了改造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能够成为一名新人。

在秦城劳动时，我们的伙食搞得很好，每天都可以到河边去洗澡、洗衣服。而且劳动时能同大自然相接触，人的心情都会变得很愉快的。所以，我认为在我将近十年的改造生活中，这一段时间是我心情最舒畅、精神最愉快的一个时期。

通过劳动改造，我端正了自己的劳动观点，联系到自己的过去，初步认识到自己过去骑在人民头上所过的那种剥削的寄生生活是可耻的，多少懂得了一些劳动人民的感情。

一九五九年十月间，领导叫我们回到功德林继续学习，又叫我们写自己被俘以后，通过学习、劳动的一些思想体会。十二月四日这天早上，领导忽然通知大家把衣服穿整齐些到礼堂去开会。待我们整队进入会场时，才知道要开特赦大会。当时，我们的心情很激动，既高兴又紧张，因为谁也不知道特赦是全部特赦，还是部分特赦。

十点整，特赦大会正式开始。最高人民法院领导讲话后，开

始宣布特赦名单。当读到我的名字时，我的心情万分激动，一时竟不知所措。我们第一批特赦的共有十人，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陈长捷、郑庭笈、邱行湘、卢峻泉、杨伯涛、周振强、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和我三人当时曾登台代表被赦人员，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再生之恩表示感谢，并表示今后要继续改造自己的思想，做一个合格的新中国的公民。

特赦大会之后，我们回到驻地，马上换上了政府发给我们的新衣服，整顿行装。北京市民政局的王局长亲自来接我们，他用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市区的旅馆。这样，我们遂告别了功德林，从战管所走上了新社会。

特赦之后，抚今思昔，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记得我在长沙上中学时读过一篇古文，是欧阳修的《纵囚论》。这篇文章谈到唐太宗李世民曾于贞观六年，将三百多名准备处死的囚犯放回家，让他们料理一下后事，与家人再团聚一次。临走时同他们约定好期限，到时叫他们“自归以就死”。等约定的日期刚到，“而卒自归无后者”，竟然全部回来了。当时，我读到这一段，觉得唐太宗确是了不起，对他的作法感到十分佩服。可今天仔细一想，唐太宗的作法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对待战争罪犯的作法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唐太宗的纵囚，不过是沽名钓誉，收买人心。正如欧阳修所说：“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而党和政府对待我们这些罪犯采取的方法却是既人道，又实际的改造方法，目的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犯人能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要比唐太宗的作法更具有积极性，进步得多。

翘首神州，更觉往事如梦、如烟。但这十年的改造生活，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永远不能忘记，是中国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把我从一个战争罪犯改造成了一个新中国的公民。